

第1版
2017年7-8月 总第76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 世界文化論壇

##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美] 菲利普·克莱顿 李勇 高继鑫 译

一、引言  
人人都渴望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我们的地球需要繁茂的森林来消纳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还需要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来保证土壤的健康。全人类都在寻求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案。九月份，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杭州会面，承诺两国将遵守在“巴黎气候协定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上制定的准则。两位领导人还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旨在限制两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之相对应地，中国制定了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环境政策。

当然，西方世界也存在着全球变暖如何阻止全球变暖的争论。然而，他们却很少探讨环境危机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松懈的（或者说不存在的）政府政策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竭力满足的是符合其持股人短期利益的需求，它们不会把环境破坏视为经济损失，结果就是有关环境的损失就被忽视了。2014年，仅在北美洲，石油公司就获得了2570亿的利润。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中，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他们仅仅在购买和消费事务上才是重要的。所以在美国，可以看到人们驾驶着大型汽车和私人喷气式飞机，毁灭森林以建造他们的豪宅，因为他们相信随心所欲地污染是他们的权利。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众多消费者追求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和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企业为获得潜在的利润而回应消费者的这些需求，而政府放任整个过程的急剧失控。科学家们警告说：如果不停止这一恶性循环，将会发生风暴、洪水和干旱，将带来饥荒、大量移民和战争；进而造成社会结构崩溃、全球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倒台。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优势：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则已经包含在宪法之中，存在着限制个人和企业为攫取利润所做出的破坏行为的权力。同样，人们也能从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资本动力学 (the dynamics

of capital) 所做的卓越分析中得到指导。  
鉴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那么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案必将是社会主义的和生态学的。在英语学界，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组合术语——生态社会主义 (Ecosocialism)，并且有学者已经确定了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在这里，我打算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实际上存在着三个阶段。由于，我是在这场谈话中首次表述这一观点，因此我很希望倾听你们的回应和评论。

二、前两代生态社会主义  
多年以来，西方的环境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很少存在联系。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 (the Club of Rome) 的报告起，环保人士开始关注科学数据和预测未来，但他们并未对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予以充分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楚的证据表明，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无节制行为应该为环境的被破坏而负责。社会主义者作为西方对资本主义无度放纵的主要批评者，力主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克服环境危机的必要步骤。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和保罗·伯克特 (Paul Burkett) 因确认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前两个阶段而广为人知。根据他们的观点：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是相结合的，但这并非真正的整合。马克思主义范畴经常被简单地加在已有的环境范畴之上。更为典型的是，环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的作品是具有“生态缺陷”的。第二阶段则转到了相反的方向。这一点更多地归功于保罗·伯克特、约翰·福斯特和其他认识到“人类境况之生态基础”的学者。他们正确地提出，“经济发展应得到规划，以便包含水资源及其分配、干净水源的可获得性、不可再生资源的定量配给和保护、废物处理、污染的影响以及与环境相关的工业计划特殊选址等因素。”今天的环境危机包括“各种各样的问

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的衰减、珊瑚礁的消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基因多样性减少、我们的环境和食物中日趋增长的毒性、沙漠化、可获得水源的缩小、洁净水源的匮乏、还有放射性污染——这只列举了一小部分。”马克思并不了解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也无法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对于我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

然而，伯克特和福斯特却认为我们应对今日环境危机所需的都已经包含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福斯特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 (“metabolism rift”) 一词有人译作“新陈代谢断裂”，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则将其译作“物质变换”。因为后文作者有解释，译作“物质变换”则语言同义反复，而且不易体现生物学、生态学背景之区别，故为保持文脉顺畅，文中除直接引用马克思原著外据汉译文集译作“物质变换”外，均译作“新陈代谢断裂”。) 观念解释成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生态思想家的例证。他也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用于环境问题。福斯特的确确实实有助于克服“马克思主义反环境”的那种陈腐论调。马克思并非只关注克服资本主义的不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而不关心自然环境。他不仅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和政治体制方面，也同样施及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价值领域。马克思同样认识到，资本主义也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裂。

故而，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回归到诸如“新陈代谢断裂”之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问题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生态科学尚未发展起来。如果一个学者认定的主要标准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他便不是一个当今语境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家。这正是我将福斯特称作环境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换句话说，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生态哲学。海尼根

(Heineken) 对这一问题总结道：“对环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于，一种（关于）外在生物物理环境的唯物主义（观点）使得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两极分化得以保持，这种二分法造成了社会科学结构中组成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之间差距的增加。而且，马克思的著作中同样存在着其他方面，比如说在讨论什么引起了‘温带地区’的工业化时，他表现出了对‘人类支配自然’的让步。”海尼根和她的合著者指出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把人类当作预设，如果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那就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利用。她们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马克思并未完成一种综合，即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和作为包围并规定着我们的生态系统的自然之间全面有机的关系。虽然如此，她们还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说法，“马克思给出了‘新陈代谢’的概念，并进而觉察到作为交互系统的自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无论如何，生物学的视角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虽然动物和人类都依赖“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化学反应。这些反应对于“保持细胞和有机的体的生存状态”至关重要，比如：分解分子以便为身体提供能量，合成化学物质以便完成细胞彼此间的活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物能量学”仅仅描述了支持生命的物理化学过程，而没有描述生命自身的本质——其中更缺少对社会和政治交互作用本质的描述。研究“新陈代谢”的科学家就是在研究“细胞最终以获取能量的生物化学或新陈代谢途径。”所以，当马克思借“新陈代谢”的隐喻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他正确地理解了能量传递的问题；但他尚未表达出在一个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中，作为生物的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完全的、生态性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是我们的家园和身份认同之所存在，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能量来源而已。

值得肯定的是，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就认识到了农业的产业化正在损害土

### 本期主要内容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第1版

农业的新生需要第二次启蒙

第1版

有机马克思主义：质疑、回应与评估（上）

第2版

中国的现代文明和生态文明之争（下）

第3版

第3版

第4版

壤、水源和大气。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译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009年版，第919页）而“新陈代谢”正如马克思所正确描述的那样，意味着“有机体内部、有机体之间、有机体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译按：此段引文参见“保卫生态马克思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回应一批批评者”，书评发表于《气候和资本主义》(Climate & Capitalism), 2016.6.6.) 当然，生命确实依赖于“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但这些交换并不能定义生命之所是的全部。这尚未抓住生态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尚不完善的原因，也是福斯特尚未认识到的差异之所在。

反之，如果研究近25年来兴起的生态科学，就需要在一些相对重要的领域更新马克思的科学观点。例如，19世纪对“新陈代谢”的理解就非常不同于现在对生物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科学理解。无论如何，只要通过这种方式更新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就不再是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了。

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三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它帮助我们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学习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我们可以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当代优秀的科学家。当然，这一整合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这必然像是在两颗树苗之间进行嫁接，以使它们能够长成一株苹果树，这种让事物共同生长的方式就是“有机的”。如今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所做的整合便导向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思想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它是一个使所有部分都深刻联结为单一整体的系（下转第2版）

### 农业的新生需要第二次启蒙

—读《第二次启蒙》有感

中国农业大学 胡跃高 教授

饥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伴生因素。约在10000年前，世人嗷嗷待哺，人命悬一线之时，农业的创造与产生成为了人类的第一需求。于是，农业诞生了。其观察农业的全部发展历程可以推断，从其创立开始，农业便具备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潜能。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一旦食物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农业的重要性随即便让位于其他的社会活动。人们很容易想象近10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是一幕国家或社群以农业为河床，以其他社会活动为河流，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剧。一直到今天，世界农业安全问题第一次呈现全局性爆发态势——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农业的常规潜能行将耗尽，大部分河床水落石出，人类历史上再一次面临食物绝对短缺，文明世界命悬一线。

回溯历史，人类先祖竟然能在如此久远的石器时代，开创了农业伟业，先民们智慧之高远，不能不令当代人顿生崇敬！——在当时只有石器、陶器、弓箭等简陋工具的条件下，先人们曾经历了怎样的艰苦磨难，才一步步地寻觅到了农业之路！

今天，继承着祖先全部基因的人类后裔，面对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新的、巨大的挑战，能够不辱没先人盛誉，在险象环生中再创新的万年基业么？细读王治河、樊美筠著作《第二次启蒙》（下简称《启蒙》），不禁让人联想如潮。

#### 1、第一次启蒙的定位

第一次启蒙指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

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在中国，第一次启蒙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呼唤民主和科学，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佛斯曾在比较两者关系后指出，在中国即使是“五四”时期最保守的国粹派阵营，“对作为西方建构的现代性也没有原则上的反对”。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发生在欧洲与中国的两场运动间是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尽管在发起时间上彼此相差300年左右，整体上可视为是一体两态的统一体。进一步联系近代第一次启蒙在全球的展开过程，我们便概括为：近代世界的第一次启蒙原发于西方，是单一起源，其持续了约400年左右，已经波及世界，是一体多态运动的过程。《启蒙》指出：上述活动“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之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第一次启蒙’。这是对世界启蒙运动发展的历史把握与准确定位。

#### 2、第一次启蒙思想与行为存在的偏差

第一次启蒙“在将人们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在唤醒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尊严意识方面……特别是它对自由精神、平等意识、民主参与、个体尊严的推重，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这是时至今日，第一次启蒙在全球范围内依然余波荡漾的根本所在。但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来都是杂糅误读，不断从错误中学习，摸索前进的历程。《启蒙》总结指出，第一次启蒙存在三方面严重的思想认识缺陷。

##### 2.1 对自然的奴隶主态度

第一次启蒙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迷信束缚，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在面对自然时，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割和剥削

的对象，随意生杀予夺，彻底背离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德里达认为，不老实实在、规规矩矩听话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等非人类生命，可视作“流氓”等。这类思想作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传播、蔓延，成为近代人类在开发水源、能源、矿山、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发展工业，建设城市中无所顾忌，恣意妄为，成为导致传统自然面目全非，生态灾难危机四伏的思想根源。

##### 2.2 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

伊曼努尔·艾斯在《种族与启蒙》一书中系统收录了启蒙思想家的言行，证明了他们思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他曾考察休谟与康德，论证了种族主义不是其思想的“偶然事件”，“而是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哲学学说中”。伯利亚科夫认为：“种族主义是启蒙科学的一个孩子。一个未被启蒙运动承认的孩子”。在18世纪的法国，穷人主要是农民，伏尔泰觉得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方翌，2015）。上述思想最终成为将人群分为高低贵贱，国家划分为三六九等，国内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世人熟视无睹、演化日盛一日不能自己的全球社会经济格局分化定格的基本思想源泉。

##### 2.3 对传统的虚无主义观

第一次启蒙者视一切传统为垃圾，欲急匆匆地与之进行彻底决裂。恩格斯将其描述为：“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在中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打倒孔家店”，“现代性作为西方

的财产”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断裂与中国传统的决裂”，急切地亲近西方，彻底西化。钱穆曾在教育领域观察指出：“新学校兴起，则兼承西化而来。兼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尊，也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也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揭示出其割裂历史传统的行为特点。

总而言之，由于第一次启蒙在根本上与自然对立，在理论上关闭了进入自然空间的途径；对他者如敌，遂堵塞了全人类亲友大家庭联系；视传统若无物，断绝了文明源流。在第一次启蒙于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先进世界”剩下的只是困兽犹斗般的科学激情、偏强与孤独，还有恐惧及攻击的心理与行为。

由上述基本思想构造本质特征推断，第一次启蒙不论拥有多大的优势，都将必然地走向了全球发展中的局部、短期、僵化、偏狭的运动思想与行为。人们可以观察到，尽管第一次启蒙其思想有时不乏青春活力与光芒，其行为间或激烈悲壮，其结果成就独特，其行为组合效应新奇，但用不了多久便在历史整体上暴露出了其局限性、不稳定性、两面性与简单性，以至作茧自缚，悄然停摆于行将跨入全球系统门槛之时。从农业文明结束到生态文明开始，是全部第一次启蒙的生命过程，它的名字叫工业革命。《启蒙》作者完整地总结了第一次启蒙根本缺陷，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思想大解放指明了方向。

#### 3、农业陷入了深度困境之中

##### 3.1 第一次启蒙前的欧洲农业基础

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时曾分享当时盛行的观念：“农业是文明的标志。”苏

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坚信农业是希腊社会的根基，是希腊文明的养育者。农民必然是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有本领和有勇气保护自己的农场，也就能捍卫古希腊城邦的自由。他称赞务农是最好的职业，农场是最美丽的土地。所有美好生活的要素（食物、公民权利、合作、正义、勇敢、爱国、自由和对神的崇敬）都能在农场这所学校中获得。

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2014）指出“如果希腊人是自由的，小型农场就能继续造就其文明。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终结了希腊式的民主和自由。罗马人认为自己天生的统治者，崇拜帝国，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喜爱的种植园对小型农场的替代。”在希腊与罗马时期，受地中海周边便利、海运便捷影响，欧洲文明走向了以城邦为核心、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方向。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系古希腊“城邦”的代称，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主要指的是“城市文明”。乡村和农村则是没有文明的。

柏拉图《菲多篇》中曾记载到，当苏格拉底跟着一个雅典市民朋友出了城门来到一片梧桐树林的时候，他对这个朋友说，他很少到这种地方来，因为自然不是他的老师。在苏格拉底眼里，“只有城里人的知识才有价值。”（王治河，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2014）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是第一次启蒙的基础。这是一个由两河农业衰落史、埃及农业衰落史、古希腊农业衰落史、罗马农业衰落史，以及海洋文明史、商业文明史共同构成的历史基础。农业起源、衰落；扩大范围，再建立，再衰落；进一步扩大范围，以终结农业衰落，走向未来，在更大范围

### 徵稿啓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

###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鞠賈凡 安樂哲 溫恒福 張修玉

###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李銀玲

## 有机马克思主义：质疑、回应与评估（上）

管小其 博士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大批有远见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持续展开。与此同时，“一批有眼光的学术新锐已经开始立足中国的现实，致力于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本土化，开出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积极地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严峻挑战”。加之自2006年世界上创立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营美国加州克莱蒙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白、融合、激荡，并最终孕育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相符的、具有国际范的新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毋庸赘言，“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由中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合力打造的“真正成长于中国传统的新形式马克思主义”新范式甫一问世，就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关注并迅速引发热烈的回应。国内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敏锐地把握到这一学术热点，不仅有数量可观的学者撰文论述、探究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意义，国内期刊界也对这一学术前沿纷纷跟进——不到两年间，《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求是学刊》、《江海学刊》等知名学术刊物上便发表了40余篇论文。不止于此，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理论研究视野、加快科研力量整合、提升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水平，国内一些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如由党委书记赵月霞同志担任主任的河北师范大学“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

“过程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太原理工大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科技伦理研究中心”。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高峰论坛暨中美哲学家论坛（2015年7月11-12日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第10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2016年4月29日至30日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举行）、“系统思想，过程哲学与生态文明2016国际研讨会”（2016年7月8日至10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等会议的核心议题；就在2016年7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还召开了“首届有机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太原理工大学7月3-4日召开“首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五大发展理念国际会议”。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一大亮点。当然，正如本书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章所示，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国内学术界给予了总体上的认同与肯定。

尽管如此，也应看到，有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甚至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表达了质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及其现代性批判的质疑。

例如，有学者在肯定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于在当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同时，也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进行的五大必要的“修正与更新”——（1）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2）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切市场力量；（3）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4）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5）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就此而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大成疑问，更遑论它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超越”。

另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语境、话语和学术传统并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免存在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譬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认为历史发展不可预测、无规律可循，陷入某种唯心主义的泥沼；过于夸大思想文化、宗教传统等上

层建筑的作用，以致片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

还有学者认为，当“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把怀特海过程哲学中的“动在”与“互在”理念输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内，并据此为生态文明奠定哲学基础时便会导致双重误解：一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降格为它已经本质超越了的自然唯物主义；二是误解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把自然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作为生态文明之合法性的根据。他们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足以作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出发去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生态文明奠基，不仅是舍近求远，而且严重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水平。

其他学者还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比如将马克思主义误解为“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误解为主张“消除一切市场力量”，误解为与资本主义一样追求增长、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

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具体主张进行了批判，提出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农村经济形式和小城镇经济形式的复古回归、“混合制”主张的片面性，无法真正超越公——私的二分法，以及“共同价值观”的存在性问题突显了理论上具有先天缺陷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也必然行不通。

值得关注的还有学者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有误”的论断，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是按照其反复批评的现代性“非此即彼的思维”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贴上了“历史决定论的标签”；与此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而是进行了新形式下的价值观念替换，在“适当调整”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目标；放弃了公有制这一根本基础；放弃了无产阶级这一根本主体。

面对上述质疑，有学者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正在生成与发展中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流派，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我们不能把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完美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观点，更不能夸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与价值，更不能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要深化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进一步重视、切实加强研究并准确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质疑，都是值得予以认真回应的。而在此基础上，展望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更是不无意义的。更何况，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既自知其理论本身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明白相关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故而存在的一些不足，故此他们都有着极其开放的心灵而欢迎和珍视“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可以促使他们“把问题想深想透，非常有助于促进理论成长”。

反观上述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何评价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此外，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与更新，是偏离了还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与此相关，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一样足以作为生态文明奠基？第四，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具体主张是否行得通？第五，有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问题进而又可以简化为理论与实践两大课题：（1）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2）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实践指导意义的评估问题。下面，我们先来分析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 二

毋庸置疑，要探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前提便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一

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探析便是十分必要的。

必须承认，“虽然马克思是20世纪人们谈论、研究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关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我们并没有梳理、甄别清楚”。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一词最初是作为反马克思的贬义词出现的，以至于连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学说。从正面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是由第二国际代表考茨基于1883年4月6日，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中首用的，之后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广泛流传开来，一直沿用至今。经典作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从不同语境、不同视角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许多重要阐释，然而都未定于一尊，不仅如此，“权威”界定也有其不那么严谨的情形。总体上看，我国理论界对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尚无定论，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尽管精神实质相近，但仍然未能统一。如果有人还坚持认为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需回顾现代思想史便可发现，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源于第二国际时期，这一马克思主义正统“以考茨基为代言人，而且以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解释为基础：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既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权威、科学方法和预测的确定性，又声称借助辩证唯物主义能够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它是一种（就像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那样）把19世纪获得胜利的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解释”。换言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某些阐释而已，一旦脱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其思想所产生的特定语境，其真理性是难以保证的。苏联、东欧曾经出现过把马克思绝对化和神化的情形，也曾一度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解释乃至误读和歪曲，这启示我们，“不能通过原理教科书和后人特定条件下的阐释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文献才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只有对其重要文本个案进行全面、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才能呈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创、复杂性及其演变轨迹，进而彰显其思想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力。”这是需要人们注意的。

与此同时，值得强调的是，一方面，必须“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问题在于，“在把握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时候，所依凭的文本不同，勾勒出的形象会有极大的差别。比如，20世纪大多数学者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具体革命中你死我活的专攻策略。而又有一些论者则依据博士论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相对理论和多元化选择论以及渐进式和平改造的策略。……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各种观点的论争相伴始终。澄清这些理论纷争，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是一条重要途径”。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不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定于一尊，即便我们接受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注释中所提出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应当清楚，马克思主义并非给定之物。正如已故的英国著名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像所有名副其实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项永远处在发展中的工作”。亦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也并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特别是马克思辞世时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

（上接第1版）统。有关这一思想的最佳引导就是有关生态系统的研究。在经典生物学中，我们通过部分建立整体：生物化学（biochemistry）、遗传学（genetics）、细胞生物学（cellular biology）、关于有机体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organisms）等等。相反，在现在的生态系统研究中，我们从整体开始，据此理解每一个部分。蜜蜂需要从花朵获取花蜜，而花朵必须由蜜蜂授粉。我们的胃为许多不同种类的细菌提供了家园，细菌反过来分解我们吃下的食物，以便我们将其代谢。这些关系中的每一种都是彼此互惠的；每个个体都相互依赖。这种关系不是等级森严的，而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适用于生物学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所有人在共同体中相互联系着。正如孔子所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最好为社会整体服务，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是自私的。传统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有机伦理学（organic ethics），因为它乃是奠基在作为一个伟大整体各部分的人们彼此间的有机关系之上。这一理论适用于社会关系，也适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体现在儒家有关天、人、自然著名的三角联系之中；它也体现在《道德经》关于阴阳的思想之中；而且，它还表达在新的生态学之中——这门学科认识到人类行为比其它因素更多地影响着自然界。

《资本论》的著名片段描述了这种思考方式的对立面：“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译按：即metabolism），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

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三卷，第959页）（译按：见汉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2009年版，第928-929页）。马克思在这一著名的片段中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把自然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要么就被自然盲目的力量所统治。然而，在下一句中他写道，自然“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幸运的是，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当代生态学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同自然的互惠关系之中。当我们同自然保持和谐时，我们并不控制自然，自然也不统治我们。其结论是：有机思想包含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欢迎每一种关系。它是广泛联系着的，因为所有部分都联结在一起。由于这一系统的不断变化，各种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 四、作为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而正确的行动也依赖于正确的分析。今天我已经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共生的步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最新生态科学的首次全面的整合。由于我的专业是西方的环境政策领域，而且我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我无法对有关的中国政策提出建议。但是，我可以阐述五个通则以接近这一论题，这些通则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

（1）总是应该依据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统一来做出行动。古代中国的和谐观念不是直接的指令政策，但它却是最好的

政策指南。通过重视社会与自然和谐而非人类单独的控制，我们会得到干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与健康的土壤。

（2）仅仅回应消费者眼下需求的短期解决方案会导致长期的问题。只有长远的眼光才能指导正确的行动，有效的政策必须以长期目标为指导。作为一个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用我们中国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制定单独的政策或长期的规划，都应该从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一角度出发。据此可以决定，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建设社会的各个部门，以便为我们所需要的改革做出贡献。

（3）更新马克思主义以适应21世纪。在西方，高度发达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已经伤害了穷人和地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学习如何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下吸收市场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变得无法分辨彼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任务是要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适用于21世纪的语境，能够为今天的政策制定提供真正的指导。我们需要避免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错误，他没有在其马克思主义的承诺和当今世界的经济现实之间实现和谐。

（4）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南。生态社会主义者可以理解为环境的利益限制资本主义力量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能够解释为何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伤害地球。无论如何，为了这一合作关系走向成功，生态社会主义

需要同真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合作。

（5）作为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三个要点。（a）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表明，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19世纪的物理学、化学、决定论基础之上。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被转译为有机的比喻时最为恰当。社会是一个生命系统，所有系统间都相互联系，复杂系统的行为不能被完全预测，我们通过反馈回路管理这些处在持续变化过程中的系统。

（b）我们必须一直将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看作是一个单一实体的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工业、运输行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应努力实现同自然的和谐共处。环境影响不应该在政策制定之后才考虑。人人都应寻求人类行为和自然情境的整合，这对于社会的各个部门以及制定长远规划来说更是如此。（c）最终，由于所有系统都相互依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类存在的所有维度都能够为成功做出贡献。中国传统哲学、儒家美德、中国历史的各个细节——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追求一种独特的生态文明。语言、文化、艺术、政治改革——个个都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策。（当然，这一点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一样。）

## 五、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将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紧迫性。我们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影响的分析同当今世界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为何现在有许多跨国公司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正在伤害人民群众和地球？为何西方国家支持无节制的资

本主义的政策要不断增长的生态灾难负责？马克思主义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破坏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真理性也愈发显明。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确证这些真理。在生态灾难的背景下，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确证它们。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走出了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即环境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未整合情况下的共同发展。我们也必须走出第二阶段，即认为用马克思时代的科学——诸如自然与人类之间新陈代谢断裂之类的观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位生态学家。科学已经进步了，当代的科学比150年前的科学远为精确和强大。我们必须要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科学来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为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辩护的原因，因为它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洞见。这不是一种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是和身边的动植物，乃至与地球自身同呼吸、共命运的。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社会世界——价值和共同体——是如何同自然界有机联系起来的。像中国古代哲学家认识到的那样，仅仅存在于世界上一个小角落中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当我们生活在最广泛的和谐中，即生活在关于人、自然、天地和综合性和谐中时，我们才能过上真正的和谐生活。对于生态学家来说，真正的和谐是有机的和谐。于是，当今天的生态学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

众所周知，马克思自青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的人生目标，他明确表示，“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为此，他将工作的任务确定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任务。后来，他创立了一种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的“新唯物论”——实践唯物主义，最终确立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我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为促成“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奋斗终生。当然，马克思令当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现实性无疑在这些方面：“他批判世界私有化；批判程度惊人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商品拜物教在利润竞赛的加速中的致命扩散；批判它难以满足的、将一切置于市场的无人格规律下的空间占有欲。”

正如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在其影响深远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言：（下转第3版）

## 中国的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之争（下）

[美] 《美国社会经济学》主编 克里福·柯布

## 向生态文明转变

当人类放弃征服自然而去适应自然的时候，就代表地球辩证法进入了生态文明的阶段。但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所有层面都是围绕征服自然组织的，这点如何可能呢？实际上，在现有政府、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体系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恢复人类与自然的伙伴关系，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实现彻底的转变。我们已经渐渐适应了生态友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稳态经济秩序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廉价能源和相当稳定的气候基础上的。向生态文明转变就需要我们放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造就的状况是与人类为敌的。例如，在大约20年的时间，必须逐步淘汰汽油开采和精炼，煤炭产业，以及电力行业中生产。这听起来可能很极端，但即使这样做也太晚了，因为严重的气候问题已然形成，它会削弱人类生存的机遇。向生态文明转变也要放弃塑料产业。在生态文明那里，集成电路可能仍会生产，只要他们的生产原料来自不同物质和使用很少的能源。所有技术都必须经过同样的测试，即自然体系能够循环废物，以及能够依靠分散的能源来进行运作。

为了把经济建立在物质完全循环和太阳能的基础上，必须将当前全球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的浪潮扭转过来。主要的能源一旦分散化，人类居住地也必须分散化。对于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而言，90%—9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和依靠农业生存。生态文明更接近这一状况，而非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扭转这一状况意味着人口会从大城市迁移到小一些的城市，从小城市迁移到乡镇，从乡镇迁移到村庄。所有层面的工作都会更少地使用机械能，而更多地依靠人力。

然而，因为人们都希望居住在城市，世界上所有城市都会自发地产生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这种状况的改变并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想移居到农村这种状况，只能在疾病爆发以及城市居民开始意识到大范围疾病在城市比在农村致死率更高之后才会发生，例如SARS和埃博拉。另一个迁移的动力则会来自城市的粮食价格。许多国家政府给城市的粮食提供补贴，但这一情况的维持会变得更加困难。肉类价格的上涨非常快，从而导致肉类消费下降。增加农村地区农民自养家畜的数量，这种做法可以引导一些家庭移居到那里。

对于没有简单技能的城市居民而言，农村生活会非常困难。想象一下，如果你决定移居到乡村农庄生活并自己种植粮食，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除非你具有一些农村生活经验，否则你会从哪里去学呢？无论从生态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讲，高效的农业都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不仅仅是关于庄稼的知识，还有保护庄稼以及让其健康成长的野生动植物知识。我们可以围绕这些方面开展实践指导，从而让成千上万的人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基于生态原则的小规模生产。除非学生们相信城市没有出路，否则他们不会严肃地看待这些问题。

如果未来这种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得以发生，就必须克服很多艰巨的困难。

## 不相信官方信息

普遍怀疑来自政府或大型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但与此同时，人们却经常相信来自社会媒体的零散信息。当危机越来越严重时，谣言四起，而可靠的知识却变得很少。因此公众会怀疑有关危机的科学证据，并认为这些证据背后都有政治目的。

气候变化。

在接下来的30年里，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显。温度不仅会上升，而且风暴会变得更具破坏力。世界上的主要河流特别是亚洲，当非常急需灌溉用水的时候，在夏天会变得干涸。而且，疟疾和其他由昆虫携带的疾病会向北方更远的地方传播。海洋中较冷地方的生命会因为海水酸化而急剧减少，从而破坏了食物的一个主要来源。过度捕捞也会让人类食谱中许多种类鱼类减少。

现代化的故事是很乐观的。它给了人们希望，即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和更健康。但资源的减少和充满敌意的气候很难让全世界的人相信这个故事很乐观。相比西方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更加适应未来的人类。乐观的状况是，文明的新故事是建立在人格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改善物理环境。但更可能发生的是民族主义，即为了保持他们所归属的群体，战士们起来战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到处都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故事，因此未来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对世界大多数人口都具有吸引力的新出路，否则唐纳德特朗普就是世界未来领导人的代表。

## 极端不平等

19世纪，奴隶制走到了尽头。但这只是因为机器比人力效率更高。在能源昂贵的时代，伴随机器的衰落，极端不等的情况会再次变得普遍，尽管它并不必然就如奴隶制一样。自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世界就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基于私有权的不平等会变得更加极端。不建立支持社会化的新体系，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就会失败。迄今就人类历史而言，能够激发个人动力，又能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稳固所有权体系是不存在的。

## 农村住宅和市场体制缺乏

缺少农村住宅和适应移居的经济体制，这是扭转当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严重障碍。在美国，要吸纳大量城市人口，就必须在小城市兴建30-40亿的新房。从更大范围的角度上讲，中国也同样面临这种情况。在很多情况下，现在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会憎恨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在美国，农场相对是很昂贵的，因为大多数家庭不可能负担得起。那里也没有支持粮食生产的消费市场，而且只要粮食远距离运输相对而言很便宜，那么就很难去发展培育这些市场。因此，农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尽快改变，从而让这种转变变得可能。相比美国，中国会有很大优势。因为中国现在就有一个能够让小规模生产者适应当地和区域市场的体制。

## 缺少相关知识

现代知识体系都是基于强迫自然适应人类设定的条件这些方法论建立的。生态文明则是基于人类学习适应所发现的自然模式。近几十年，世界所有国家接受的现代教育体系，它所能提供的知识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毫无用处的。学院和大学不仅要定位在农村地区，而且这些专业的所有课程也必须与人类学习适应自然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相适应。能够教授这些思想的教授很少，而具有直接经验的甚至就更少了。让教育重新围绕解决普通人在生态文明中所面对的巨大问题进行定位将是艰巨的任务。

人口过剩。

因为以前殖民地私有财产权体制允许一些富有的

地主把人们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并种植出口作物，如咖啡、茶叶、香蕉和可可。我们不知道大多数国家要养活其人民需要种植多少粮食。但我们可以给出数百年来不靠大量投入集中能源的生产方式，一个国家能够容纳多少人口。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可能已经过剩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死亡率上升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也意味着暴力冲突的增多，因为人们不会甘愿饿死。如果人们向乡村迁移，那么综观人类历史，对人口增长起着非常重要限制作用的城市化就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了。当发生人口向乡村迁移时，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城市人口的历史趋势会导致出生率上升。这会招致更多的苦难和暴力，因为必须降低出生率。

## 战争

在社会富足和充分就业的时候，保持社会和谐是很容易的。当失业率上升，包括内战在内的国家内部动荡会增加。2008年，当食品价格突然上涨时，大约10-15个国家因为食物发生了动乱和抗议。在遭遇极端天气和化肥价格高企的年份里，这幕场景会再次发生。因为食物短缺而逃离本国的国际移民也会遭遇更多针对他们的暴力活动。今天的叙利亚内战，许多派别与其他派别的斗争在未来可能将成为普遍情况，而这种争斗超出既定边界就会演化为区域战争。争夺灌溉水源控制权将成为引发国家之间战争的主要导火线。围绕想象中的话题也会发生斗争。当问题超出了国家领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找一只替罪羊，从而把社会敌对愤怒的浪潮从政府身上转移开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拉克与其邻国，或者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状况已经酝酿了数十年，这些都可能导致一场大战。一旦某个国家使用了核武器，那么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几率就会不断提高。因此，一场边境争端就可能导致全球走向毁灭。

森林滥伐、农业和海洋渔业都在导致科学家们所说的第六次物种灭绝事件。灭绝毁掉了我们生存所必需依赖的物种，而且我们试图在边沿土地上种植粮食加快了灭绝的速度。现在哺乳动物正在以超过正常速度20倍到100倍的速度走向灭绝。有机体（如蜜蜂、土壤有机物）这些无偿支撑农业的物种正在不断减少，农业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导致了这一问题。美国许多农场的土壤剂正在完全死亡。没有人工肥料，就无法种植任何庄稼。要消除这种损害将需要数百年的时间。然而，要用更少的水和更少的肥料来种植更多的庄稼，就必须改善所有的土地。让开发过的区域重新恢复植被能够让土壤再生，但因为我们要在所有可能的空间里种植粮食，这将阻碍在贫瘠的土壤上重新恢复植被。最终，地球上的沙漠将持续增加，而阻止沙漠扩大的努力实际上可能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

## 现代化的理念

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最大障碍是这样一种现代理念，即人类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包括人类过去努力解决其他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问题。因此，一些工程师没有去关注寻找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他们现在提出的庞大计划是减少到达地表的太阳光。即使在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了解决问题之后，他们却继续沿着管理自然的相同路线去思考问题。我们可能把这视为现代思维的失败，它需要时间去反思。如果一个人想要控制自然，在不考虑这种解决方案可能在未来引发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他足以找到一种局部的解决方案。所有人都拥有一辆私家车解决了出行问题，之后城市就因

## 柯布院士关于西方发展路径的反思对建设“富强美高”新江苏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东南大学 刘魁 张苏强

建设“富强美高”新江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江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江苏“十三五”现代化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是摆在江苏政府及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地“以西方为师”，无形中形成了对西方发展路径的依赖，以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江苏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发展路径依赖。鉴于江苏目前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如何实现“强”、“富”目标与“美”、“高”目标的统一，基于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B·柯布（John B. Cobb, Jr.）的建设性后现代发展理论，从摆脱西方发展路径、实现后现代创新发展的视角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柯布院士对西方发展路径及其困境的现代性反思

柯布院士在国际上以倡导“建设性后现代”“绿色GDP”“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著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赞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友好人士。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他就已经意识到西方现代性及其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反思西方现代性，倡导绿色GDP，寻求现代工业文明替代方案，强调走“增进人类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从历史的角度说，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启蒙运动对传统宗教抹杀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及其“万物之灵”的优越性。现代性有多种表现形式，目前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点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与资本主义结合，又具有了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征，从而产生人性和社会的异化。在经济上表现为自由主义，强调工业化，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在文化上表现为强调个体的创造性与

为交通堵塞而变得寸步难行。汽车烧油会排放废气，在只有一些汽车的情况下，这点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全世界的汽车数量超过10亿，这就导致了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现代思想把问题敲成了碎片。但它并不善于从整体角度看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碎片拼起来。

我所讨论的问题清单并没有囊括所有领域或者无所不包。实际上，列举清单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即它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解决，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面对很多死循环，在这些循环里，每一个问题都使得其他问题更糟糕。生态灾难会导致经济危机和引发失业者的愤怒，失业者会制造政治骚乱，而这会导致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军事解决方案中，而更少关注生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第10个问题，即让人相信我们可以为了人类利益掌控自然的现代范式。

## 结语

当开始思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就都成了黑格尔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和行动好似我们就只需在观念层次上作出改变。但是我们所需的必须是实践层面和哲学层面的转变。相比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改变来说，这些改变会让生活变得不那么便利。引发现代危机的理念是现代化的哲学。为了回应这一哲学，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发展更好的观念。我们也必须谋划一个不同的未来。

廉价的汽油和稳定的气候让我们大多数人变成文化乐观主义者，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比过去更好。现代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乐观主义的基础上。要实现生态文明的发展，就必须放弃这一乐观主义，并认识到我们给自己列出的选择是有限的。

中国应该会成为第一个认真考虑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家，这点并不令人惊讶。中国有着复杂的哲学传统，这些传统总是强调相互竞争的经验 and 观点的平衡性。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拥抱现代化是对那一传统的否定，但是现在作出改变还来得及。相反，美国文化基于盲目乐观主义，一边倒地相信足智多谋的人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我们给自己创造出来的自反问题。在美国文化中，警惕和反思被认为是虚弱的象征。

生态文明超越现代思想并不意味着要消除所有现代思想的要素。例如，现代科学方法仍然重要而且有用，但是它们必须与那种不属于科学内在部分的智慧相联系。针对生态问题，我们依靠科学方法发出警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如何回应。民主理念仍然重要，但在选举和其他政治程序问题上要强调得少一点，而在创造经济平等的条件和整合不同观点的知识体系问题上则要强调地更多一些。

只要我们能够在把现代思想放入新背景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形式，实现生态文明就是可能的。这种新的背景包含了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智慧的重要性这样一些价值。这种哲学可以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政治理论，但是因为没有一种哲学严肃对待地球辩证法，因此当前没有哪种哲学可以称为一种广泛的哲学。尽管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可以帮助构建新的哲学，但它也只是给出了部分答案。在某些方面，它仍然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只有当人们从经验中发现生态文明通过共同创造新的生活模式而展示出其真实本质，以及反思这一经验的意义时，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才会产生。

## 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会导致大量人口迁徙与失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在教育方面，中国许多高校目前正在模仿美国所谓的“价值中立”教育模式，采用专为企业制度生产工人的现代教育制度，可以说是模仿了美国教育几乎最糟糕的方面。当代美国教育鼓励竞争的做法会造就一个竞争性社会。这些都违背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初衷是教人社会化，关心他人，而非只关心自己。而在消费方式上，柯布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些障碍：由于已经尝到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甜头，由此可能导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

三、当代江苏创新发展的建设性路径“富强美高”目前已经成为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但实现的过程也面临重重挑战。总体上说，江苏近年来的经济实力已居中国前列，“强”“富”两个目标已不是主要问题，但难题在于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强”与“百姓富”的同时，如何突破两组目标之间的张力，实现“环境美”与“文明程度高”。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要追求人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走超越西方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江苏人口基数大，地域面积少，资源短缺，产业结构过于依赖于重化工和高能耗产业，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必须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所以，要扭转现行以GDP为旨归的经济模式，向绿色生态经济转型。就此而言，柯布等人提出的以“绿色GDP”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是江苏克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在发展路径上，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超越西方现代性，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目前，受西方现代性路径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颜色革命陷阱”等，所以，江（下转第4版）

王次接地气的国际会议

——记“有机哲学·有机教育和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沈阳工业大学 夏澜睿 张一鸣 李世雁

7月中旬的杭州，气温节节攀升。就在所有人都恨不得用冷风扇空调将自己包裹的时候。有这么一批人却抛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背起了行囊，顶着炎炎烈日，走进了距离杭州100多公里的胥岭村山谷深处。7月15-16日，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有机哲学和有机教育的学者们在此召开了“2017有机哲学，有机教育和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谓有机哲学（又称“过程哲学”）是对实体思维和机械思维的超越，视世界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联系特别是内在联系被看作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被视为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有机哲学正在成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撑。按照美国未来学家斯迈尔等人的分析，“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从孤立自足这一核心理念向相互依存理念的转变。”而所谓“有机教育”则是对机械教育的超越，它把教育看作一个自然有机的过程，看作一个生命鲜活展开的历程。生态文明无疑呼唤这样一种有机意识的教育。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会议主题无疑是吸引人们跋山涉水前来与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会议是由三生谷生态书院，三生谷生态村，杭州富阳区三生谷生态农业科普中心，衡水建设性后现代农业实验基地，中国过程学会，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过程哲学、有机教育和生态文明专家学者以及生态村建设的践行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

三生谷生态村是一家立志推广和践行国际生态村理念的社会企业。生态村是生态文明最佳的践行和体现，目标通过社群、经济、生态、文化世界四个维度系统活化村落，将人带回乡村，将自然带到城市。这次会议与以往在空调冷气 and 宽大的会议室上举办的会议不同，选择在胥岭美丽的三生谷生态村举办。在这里没有空调也没有其他的使人凉快的设备，就连老式的风扇也只有寥寥数台，会议桌更是用了几张普通的饭桌上粗布简单拼凑而成。去开会的人们需要穿过破碎的石板路，踏上蜿蜒的阶梯，才能到达那个不知是什么年代便已经存在的古旧的会堂。礼堂只是经过了简单的布置变成了众人在这交流学术与讨论未来的重要场所。众人在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换着各自思想与成果。

研讨会于15日上午正式召开。开幕式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

河博士主持，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现任院长克莱顿博士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发来对会议的祝福，希望会议圆满成功。随后三生谷生态村负责人汪海潮先生，美国里昂大学代理校长布伯教授，浙江杭州建德市乾潭镇包韩副镇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杨富斌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温恒福教授，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分别致辞。

第一场大会报告由王治河博士和贝克博士主持。布伯校长围绕传统、后现代主义与生态公民为率先发言，随后美国过程教育家布克瓦尔特（William Keith Bookwalter）关于整体教育制度、生态文明教育的多维并进路径的发言引人深思。二位学者的论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机教育的认知新大门。

第二场大会报告由温恒福院长和布克瓦尔特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法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杨富斌教授分享了从有机哲学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人感受到二者间具有深层次的相通相契合的内在关联。“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热爱生命，敬畏生命”沈阳工业大学李世雁教授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展现了一位富有使命感的大学教师的人生哲学。《怀特海与中国的第一次握手》的作者，浙江师范大学的王琨教授分享了他关于有机哲学与哲学影响的心得体会。中国著名生态主义文化批评家，来自深圳大学的王晓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身体意识、身体哲学的生动演讲。

第三场大会报告在王晓华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宁楠博士的主持下愉快开展。浙江大学的富瑜博士从《道德经》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二者与过程哲学的内在联系。湖北警官大学的谢邦秀教授从有机哲学的角度为与会者打开了中医绿色养生的新大门。四川大学的曾武佳教授阐释了如何从《道德经》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过程哲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柯进华博士为我们讲述了浙江省在荒野保护方面的一些可资借鉴。重庆大学的何跃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过程哲学的心得体会。

在第四场大会报告中，来自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科研处的李丽纯处长就世界整体论与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后现代转型分享了宝贵的研究成果。渤海大学教育科学院赵成副院长分享了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研究的心得体会。唐宏站先生则讲述了他作为杭州布谷乡土，厚生私

塾教育创始人、江南古村文化复兴计划和安徽小岗村改革小镇策划人等亲身经历，分享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洞察。卓尼女士通过她和先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的过程，生动展现了一个美国家长的另类育儿经。温恒福院长谈了过程哲学如何融入教学设计之中的想法。嵊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卢祥富讲述了自己与过程哲学的不解之缘。

在7月16日的会议上，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杨丽教授讲述了怀特海教育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思路。安徽大学黄毅老师分享了关于宽带教学的一些研究体会，心得。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贝克博士，用《法华经》中的故事告诉我们培养生态意识的重要性。天津师范大学的宁楠博士分享了她关于幼儿阅读的心得和她与女儿成长中的趣事。王治河博士关于从专才教育到通人教育的论述则深刻描绘出了从以人为器到视人为命的后现代教育转折。珠海联合国际学院的郭海鹏博士分享了大学之道与有机教育的心得。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罗杰先生介绍了过程哲学的生态观。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别来宾肖淑贞女士则分享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在当下的中国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共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充满希望的画卷。

在最后的年轻学者交流中，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仁龙(Rowan)博士谈了参加会议的心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生代表也纷纷发言，谈论此次会议的收获、感悟，和未来发展生态文明、学习过程哲学，建设生态文明和生态村的想法。

怀特海的思想像一道彩虹和桥梁，链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与会者，为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健康有序的和谐世界而欢聚在美丽的三生谷。同时也呼唤更多的有志之士，各领域的精英、学者、专家加入过程哲学大家庭，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短短的两天，与会者研讨会外的收获同样丰富多元。除了专家学者精彩发言的精神大餐外，胥岭村的山居美景、时时欢唱的虫鸣鸟叫、简单美味的天然有机农家菜等生态村中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令与会者收获满满。相信在三生谷、在中国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有机哲学、有机教育和生态文明必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地突出了“生态保护”的内涵，却忽略了其中“文明建设”的内涵。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补救，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全面超越，在此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类文明。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江苏的建设过程中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全面把握“文明程度高”的内涵，以生命共同体意识取代主客体意识，走以生态文明引领发展的道路。（作者刘魁、张苏强系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

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建生态文明

——第11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美成功举办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朱丽君

4月的春天，万物生发，正是加州最美的时节，美丽的生态小城克莱蒙迎来它的大喜日子。第11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4月28-29日在此召开。著名海外智库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和克莱蒙市政府，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美国克莱蒙培泽学院，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环境哲学研究中心，衡水建设性后现代农业实验基地，美中环境教育协会联合举办了此论坛。来自中国，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等地100余位中外代表参加了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生态文明与命运共同体”。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虽然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社会制度，但生态文明会让我们和平共处，理性选择我们共同的未来。因为人类与地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与地球是“同命的”，是患难与共的，因此我们与他会者应该同舟共济，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建生态文明。

年逾90的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在题为“论命运共同体”的大会发言中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共享一个地球，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威胁着作为整体的地球。面对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我相信，那些强烈意识到自己与邻居有着共享命运的人们，比那些缺乏这种意识的人们，有大大得多的机会存活下来。我们越快、越深刻地领会我们的共享命运，越多地据此采取行动，我们的共享命运就越有可能是共存共荣而不是相互毁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始人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我们不能等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文明崩溃后再提出建立为了共同福祉的体制。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建立以共同福祉为旨归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围绕共同福祉组织共同体的方式，它使人们意识到人与生活在地球上的他者是共命运的。美国著名儒学专家，耶鲁大学的塔克教授试图探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文化之根。在她看来，“共同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而这一概念比人和人类社会更宽广。克莱蒙培泽学院和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诺伊思教授则运用当代脑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我们不是孤立的人，我们彼此的确是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这与《化胡经：老子遗稿》中的“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会影响到别人，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中国环保部华南所党委书记李远和华南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修玉认为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后现代文明形态，它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著名公益组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女士则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场新的认知革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成生态文明这样一场伟大的认知革命”。

匈牙利科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格朗皮埃尔认为工业文明代表一种物质文明，它是“分裂的，粗俗的和异化的”，而生态文明则代表一种精神文明，它是“自然的，和谐的”。后现代科学可为生态文明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张卫列研究员认为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建立，实现了人类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中美后现代发

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在大会致辞中则通过引用宋朝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诗句强调“生态文明的历史大潮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由于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是中国民间外交在海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它因此吸引了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前来贡献智慧。本次会议上克莱蒙市长施罗德热情地向中外来宾介绍了克莱蒙在建设生态城方面所取得的做人成就以及即将建成全美第一个“无废物城”的愿景。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王春益研究员向中外代表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生促会合作与发展部主任靳永新先生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张惠远主任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角度对中国生态文明治理能力建设制约因素与制度改革任务做了系统分析。韩国学者韩允祺博士和李东雨先生则向与会者介绍了生态文明在韩国的发展状况。中国著名生态文明研究专家周鸿教授指出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里，包容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态观。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专家，哈工大谢保军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人生产环境的生态批判，认为这些批判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罪孽的认识，为理解工人阶级解放理论提供了新视角。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东松主张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解决人与人矛盾统一起来。王治河认为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后现代的通人教育”。这是一种“使生者和生命的生命得到滋养和改变”的教育。它所培养的是融会贯通之人和通情达理之人，是“感性、理性与灵性兼容，身心和谐、健康积极的完整人”。上海大学欧阳光明院长就如何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陈秋华院长就如何促进森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汪亦兵和友成首席战略官孙宏生就如何整合社会力量，通过跨界合作推动生态文明贡献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自2006年以来，已有数千位来自中国、北美和欧洲的生态文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非盈利机构负责人参加了生态文明论坛。本届论坛举办期间还举行了第10届“柯布共同福祉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项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与自然共同福祉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本届“柯布共同福祉奖”得主为莎伦·斯诺伊思教授。数十年来莎伦教授一直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深入沟通。她不仅自己研习气功，而且是第一个在美国主流大学里开设气功课的美国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克莱顿和常务副院长王治河长给斯诺伊思教授颁发了奖状。

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柯布院士分享了自己的对两天会议的体会，强调中国代表的到来特别是中国代表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执着精神令他看到希望，这再次坚定了他的信心：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比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最有可能做生态文明的领跑者。

（上接第3版）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平衡与公平正义。在农业上，建设小规模农场，实现工业、农业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选址要立足现有土地，反对城市平面扩张延伸而占用良田；城市要建设方便快捷的交通供应线，减少对长距离交通的依赖，以节约能源减缓全球变暖趋势。

很大的成就，但是，受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影响，江苏教育一方面注重为江苏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服务，另一方面注重学校排名，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共同体意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校及教师的科研成果的考核要比教学投入更受重视。目前，江苏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情况不容乐观，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自杀悲剧发生。为此，江苏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成长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要提升生态文明意识，防止创新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高度的生态文明引领发展。对于江苏在“强富美高”建设过程中遭遇的目标之间的张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走创新发展之路。但是，人们在探索过程中往往注意到的是创新发展之“利”，对其潜在的“弊”却忽略不计。其实，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金融管理的创新造成的，今天全球核威胁、环境污染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往片面强调科技创新造成的。人们在理解“生态文明”内涵时，往往不自觉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友成基金会以推动社会公正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发现和支持“新公益”领袖人才、建立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网络支持平台为使命，通过研发倡导、实验孵化、资助合作，打造新公益价值链，推动更公平、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建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是环境保护部直属的三个国家级环境科学研究所之一。华南所始终坚持“立足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建所方针，坚持以热带、亚热带区域环境问题研究，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群和港澳台等地区环境问题研究，河口、感潮河网、海洋等复杂水环境模拟研究，区域、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污染控制方法创新研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及华南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任务，向国家和地方提供了各种管理决策和污染防治技术支持，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國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星星之火、步履維艱。但是如果您的一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讓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 \_\_\_\_\_

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 \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

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